

苏州市社科联重大委托项目研究成果

江南 文化 概论

《江南文化概论》编委会 编

王卫平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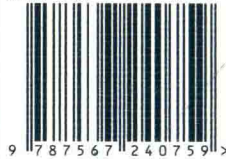
林

文化



苏大出版天猫旗舰店

ISBN 978-7-5672-4075-9



9 787567 240759 >

定价：180.00元

苏州市社科联重大委托项目研究成果

王卫平 主编



江南文化概论

《江南文化概论》编委会 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文化概论 / 《江南文化概论》编委会编; 王卫平主编.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23.5
(江南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2-4075-9

I. ①江…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文化史 — 研究 — 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27261 号

书 名 / 江南文化概论

JIANGNAN WENHUA GAILUN

主 编 / 王卫平

责任编辑 / 张 凝 刘 冉

助理编辑 / 祝文秀

装帧设计 / 吴 钰

出版发行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 215006

电 话 / 0512-67481020

印 刷 /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43.25 字数 709 千

版 次 / 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72-4075-9

定 价 / 18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481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苏州大学出版社邮箱 sdcbcs@suda.edu.cn

目 录

总论

- 003 第一章 江南地域范围的演变及其概念演化
016 第二章 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地位的确立
107 第三章 江南文化的特征及精神内涵

分论

- 133 第四章 文学发展
175 第五章 戏曲文化
216 第六章 书画艺术
255 第七章 园林文化
291 第八章 工艺美术
328 第九章 科举文化
356 第十章 科技文化
384 第十一章 学术文化
431 第十二章 方志文化
456 第十三章 佛教文化

- 485 第十四章 道教文化
511 第十五章 民俗文化
542 第十六章 慈善文化
571 第十七章 藏书文化
603 第十八章 运河文化
633 第十九章 当代江南文化的发展

结语

- 677 江南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后记

第一章 江南地域范围的演变及其概念演化

自古以来，有关江南自然、历史、人文的记载不绝于书，相关研究经久不衰，有人甚至盛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与江南有关，江南问题研究已成为海内外的显学。

研究江南问题，离不开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这是江南研究的基点。江南的地域范围变动不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涵盖的地域有所区别，以至于人们喜欢用大概念、小概念，或广义、狭义，或核心、边缘来区分。

一、江南地域范围的演变

虽然有关江南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早就已经出现，但人们对于“江南”的概念并未给予特别关注。最早关注江南所指地域范围的是历史学家李伯重，其《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一文已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之作。^[1]他提出，界定江南地区的范围，必须遵循两个标准：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李伯重虽然未对江南地区的概念进行长时段的细致梳

[1]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理，但却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区域’的内涵与外延都会有所不同”，并据其所定标准指出，“就明清时代而言，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地区，其合理范围应是今苏南浙北，即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

与李伯重的关注重心不同，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则重点梳理了历史上“江南”地域范围的变化，认为“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但在古代，江南一词的涵盖面却辽阔得多，而且经过曲折起伏的变化”。约而言之，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是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今皖南、苏南一带则以江东著称（或称江左、江表）。至于会稽郡地被称作江南，则与汉初分封刘濞为吴王并建都广陵（今江苏扬州）有关。江南的概念大于江东，江南可以包含江东。隋唐以后，江南的概念才最终形成。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划分天下十“道”，自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的广阔地区为江南道，“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由于行政建置的屡变，唐代的江南可以覆盖自江淮以南至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而“江南最准确的含义还是专指长江以南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明清时期的江南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1〕

李伯重、周振鹤对江南概念及地理范围的界定，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奠定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基调。此后所有的研究，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细化。如徐茂明从江南的自然地理范围、行政地理范围、经济地理范围、文化地理范围四个方面展开论证，认为“从‘江南’的历史演变看，无论其指称的是自然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西到东、由大到小、由泛指到特指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过程与‘江南’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的历史是完全合拍的。‘江南’这一名称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当人们使用‘江南’一词时，在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据此可以认为，

〔1〕 周振鹤：《释江南》，见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更为合理”。〔1〕冯贤亮梳理了古代“江南”含义的变迁、中国当代学者论著中的“江南”及国外学者使用的“江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自己所研究的明清“江南”，“是指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二县”。〔2〕这与李伯重、周振鹤两位先生所主张的江南地域范围并无大的区别。

但是，正如学界已经注意到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端的，不同时期江南地区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将明清时期相对认同的“江南”概念套用到明清以前，不仅覆盖的地域范围不一致，而且这种“倒溯”的方法也未必科学，存在着方法论的误区。

学界一般认为，“江南”一词最早出自《左传·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所说乃郑伯访楚时田猎于楚境江南云梦地区之事。继此之后，司马迁《史记》多有提及，如《五帝本纪》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秦本纪》称，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秦始皇本纪》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越王勾践世家》说，楚威王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秦楚之际月表》亦有秦亡后项羽拥楚义帝“徙都江南郴”的记载。凡此可见，最早所谓的“江南”只是一个指代方位的词，意指长江以南，且所指地域相当宽泛，涵盖了长江以南、五岭以北、西起巴蜀、东至大海的广阔地区；尤为重要的是，“江南”一词不是南方人的自称，而是北方人的他称。

东汉以后，“江南”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多地指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载，西汉末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东汉马援之子马防因罪徙丹阳，“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称，“时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

〔1〕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2〕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江南”还包括了江北的一部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往往是指定都今南京的南方政权，如《三国志·吴书》中常以“江南”代指孙吴，《宋书·沈县庆传》称赞，“江南之为国盛矣”，“江南”已指“自晋氏迁流”后的东晋、刘宋；《隋书·贺若弼传》及《韩擒虎传》亦有“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汝闻江南陈国天子乎”等说法。

与此同时，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还有吴会、吴越、吴中、三吴等称呼，但从战国开始尤其三国至隋朝统一全国以前，这里更多地被称为“江东”。

目前所知，“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一书中。《战国策·楚策》范环答楚王所问，谓：“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濊胡，而野江东”^[1]；赵人李园进女弟于春申君，女弟挑拨春申君与楚王之间的关系，云：“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2]越国立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兼有吴国故地，而楚灭越后封春申君于吴，故此两条资料所言“江东”均指长江下游原吴、越两国核心之地。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提到，秦末战乱期间，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召平“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即项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楚汉相争，项羽兵败逃至乌江，乌江亭长建议其速渡江还吴，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而项羽笑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即项羽）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可见，“江东”乃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而之所以称为“江东”，按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说法，“盖大江自今安庆府以下，势皆斜北而东，故江至此，又有东西之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据此认为，“之所以称作江东，是因为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走向，这段河道在秦汉三国时期是长江两岸来往的重要通道，因而从中原地区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视此段长江两岸为东西岸，而不是南北岸”^[3]。自此以后，“江东”一词越来越多地见于史籍，《三国

[1] 刘向集录：《战国策》中册卷十四：楚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8页。

[2] 刘向集录：《战国策》中册卷十四：楚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6页。

[3] 周振鹤：《释江南》，见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志·吴书》中，“江东”之地成为孙吴辖境的代称。而且，与此前“江南”为北方人的他称不同，“江东”乃包括孙吴政权在内的南北之人的通称。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称“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孙策死前召见其弟孙权，佩以印绶，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1〕。由于古人常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东”亦可称为“江左”，《南齐书·州郡志第六》即有“（晋）元帝为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实隆重”之说。

当然，在史书记载中，江南、江东、吴等概念混用的情况也颇为常见。如《旧唐书》卷四十九载裴耀卿奏漕运之事，“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又如同书卷五十四所说，“及杨玄感作乱，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这也说明，在时人的眼中，江南、江东、吴指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地域。

沿至唐代，“江南”才逐渐摆脱方位指称，明确成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依“山川形便”原则将全国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治越州，今浙江绍兴）“辖五十有一州”，覆盖了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自湖南西部迤东至大海的广阔地区，约略相当于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等省市，江苏与安徽南部以及湖北、四川长江以南和贵州的东北部地区。唐玄宗时又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其中江南东道辖今江苏南部与浙江、福建地区，约当吴越故地；江南西道辖今江西、湖南洞庭湖、资水流域以东、湖北与安徽的江南之地。“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在全国设节度使与观察使统领州县，江南东道析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节度使和福建观察使，其中浙江西道（治润州，今镇江），辖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等地；浙江东道（治越州，今绍兴），辖越州、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台州、温州等地。北宋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其中，江南东路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约当今江苏西

〔1〕 陈寿：《三国志》第5册卷四十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1109页。

部、安徽南部与江西东北部地区；江南西路大致包括今江西省境；又设两浙路，辖今浙江、上海及江苏南部镇江以东地区。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分两浙路为浙东、浙西两路，浙东路辖今浙江南部地区，浙西路辖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与上海地区。清朝建立之初，将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辖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安徽分省而治。

综上所述，“江南”的概念经历了方位指称到地域实体的演变，覆盖的地域范围富于伸缩性、由大而小。自唐代以后，“江南”概念的内涵逐渐明确，渐有集中于长江下游以南地区之势。大致而言，作为历史概念的江南区域，主要覆盖今天的浙江、上海及苏南、皖南地区，也即如今所指“长三角”的区域范围。至于学术界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范围划定为杭州、湖州、嘉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南京与太仓州“八府一州”之地，或去除镇江、南京二府而成“六府一州”之地，与上述的趋势颇相一致，或可理解为江南的核心地区。显然，这种划分还与江南内部的整合导致地区经济、文化的渐趋一体化有关，即与历史上“江南意象”的逐渐形成和“江南认同”的出现密切相关。

二、从“江南意象”到“江南认同”

李伯重先生在界定江南地区的概念时，曾经提出一个疑惑：“从元代起，‘江南’一词不再被用作行政地区的正式名称（虽然在清代江苏省有时也被称为江南省）。但令人费解的是，自此以后，‘江南’一词都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专指原来被称为吴、三吴或浙西的那个地区，而吴、三吴、浙西这些原有的称呼，反而少用了。”^[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回答这一疑问，历史学家颇感为难，需要借助文学创作中的“江南意象”概念。

按照袁行霈先生《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所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意象基于一定的历史存在与地理空间，又是对

[1]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客观人、事、物的精神文化抽象。至于“‘江南’意象的生成乃是主客观因素交互影响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是其基础，时代文化观念制约下文人的审美选择则是核心要素”〔1〕。所谓的江南意象，依照葛永海先生的说法，“乃指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江南’概念指称为中心，以及所对应的由特定地域性特征的风物人事所构成的多维复合型意象”〔2〕。汉代乐府诗《江南》对江南意象的描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中的水乡、莲、莲叶、鱼等场景要素，初步形塑了江南意象，“诗中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江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存诸于作者（们）意念中的‘江南’，笔之于诗，就是这样一片貌似定格场景，一组下意识地闪映在作者心中却从此将作为保留节目被不断重播的动画短片”〔3〕。这首古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南朝文人所作的诗歌中对江南莲花颇多演绎，如吴均《采莲曲》中的“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刘孝威《采莲曲》中的“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梁武帝萧衍《夏歌》中的“江南莲花开，红花覆碧水”等。王运熙先生曾指出：“吴歌的产生地域江南，是莲花最繁盛的园地，从汉乐府古辞《江南可采莲》直到后来无数的《采莲曲》，在在都低回于这江南的名花。”〔4〕

在后来的文人、诗人笔下，具有江南地域性特征的人事风物不断增加，内涵愈显丰富。

江南意象，是从地域风物生发的。随着汉代乐府诗《江南》的问世，水乡、莲、莲叶、鱼等遂成为江南代表性的风物。此后，具有江南代表性并成为意象的风物不断涌现。晋灭吴后，南方大批士人入北出仕，颇多失意，其中吴人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其所思之菰菜、莼羹、鲈鱼脍皆为吴中风物，乃是江南意象的典型。“莼鲈之思”的典故，为唐宋文人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白居易《偶吟》中的“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中的“雨来莼菜流船滑，

〔1〕 葛永海：《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

〔2〕 葛永海：《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

〔3〕 潘泠：《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春后鲈鱼坠钓肥”、苏轼《忆江南寄纯如五首（其二）》中的“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莼羹”等，吟诵不已。在六朝至唐宋时人的诗文中，与构成江南意象相关的风物，如最具江南意味的梅花，所谓“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一枝江南春色”“江南春信”“江南客”遂成为梅花的含蓄代名词；如杏花，元人的“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展卷令人倍惆怅，杏花春雨隔江南”，明人的“杏花春雨好江南”“杨柳晓风残月，杏花春雨江南”等诗句，将杏花与江南紧紧绑定，让人们印象深刻。此外，与莲同为水生植物的菱（“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白蘋（“笛声何处响渔歌，两岸蘋香暗起”）以及橘、竹（“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等，也是江南意象的代表风物。需要指出的是，很多风物未必是江南的特产，却也成为江南的象征，有些代表江南意象的风物，存在由北方意象转向江南意象的情况，最为典型的如杨柳。有学者在考察了文学史中杨柳的意象描写以后认为，人们总会把杨柳与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等秀丽的江南水乡风光联系在一起，但杨柳并非一开始就是江南风物的代表，“杨柳作为江南意象的重要代表，经历了一个由北方意象向江南意象的转变过程。早期作品中最常见的‘杨柳’，如‘杨柳依依’的描述，或‘细柳营’的典故，多与北方风光和边塞战争相关联，杨柳意象具有浓厚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中晚唐以来，有关杨柳的经典描述，如‘烟柳画桥’，‘杨柳岸、晓风残月’，‘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等，多与江南风光相联系”，沿至宋代，“杨柳意象基本定型，成为江南风景和文化的象征”。〔1〕

江南意象，极尽美景。随着六朝以后江南地区的次第开发，该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加之气候温润，风土清嘉，佳山秀水，四时美景变换，面对如此湖光山色、花草树木，文人们搜遍胸中锦绣，吟咏不断。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历来为文人所叹，成为后来众多咏颂江南美景诗词的底色。白居易《忆江南》词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更使江南美景传遍天下。江南之美不仅在春光，还有秋色。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题《秋景平远》图：“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

〔1〕 石志鸟：《杨柳：江南区域文化的典型象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处，家在江南黄叶村。”“江南黄叶村”安适宁静，成为后来众多诗人、画家心目中的归宿，“家在江南黄叶村，归来重葺柳边门”“投老江南黄叶村，菊花时节雨昏昏”，“江南黄叶村”成为江南温暖人生的经典意象。〔1〕

对江南美景的描写，有的是具象的，有的是抽象的。抽象的描写如“烟雨江南”给人一种朦胧、迷离的美感，宋朝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中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小桥流水人家”同样是江南意象的经典之句。

江南意象，事关吴娃越女，由此引发离别断肠之情。江南不仅具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更有多彩的人文风情。江南意象的形塑，离不开对佳人美女的欣赏与留恋。按照文学家的解释，汉乐府古辞《江南》中的“鱼”与“莲”，本就隐喻了水乡生活中的男女爱情。《采莲曲》《采菱曲》等乐府诗中，总会出现容貌清丽、衣袖笼香的少女倩影，如“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等等。如学者所指出的，“梁代诗人将年轻女子与江南代表性的采莲活动相联系并固定化，成为程式性的联想结构。仅就这一抒情模式来看，是已为后人肯定和承继了的”〔2〕。从此以后，有关江南的诗词歌赋中，佳人美女以及对佳人美女的思念成为不变的主题，成为江南意象中的重要元素。著名学者胡晓明曾经对有关江南的相思典故“江南断肠句”做过梳理，在他看来，“江南断肠句”的含义大致包括“（1）特指江南的美丽动人。（2）江南美丽背后恒有的佳丽及其情缘。（3）美得令人伤心、无限低回、要眇的心事。（4）从屈原、谢灵运，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一直传承而来优美的心灵感应”〔3〕。这种对江南佳丽美人的相思，发端于屈原“魂兮归来兮哀江南”，远溯至谢灵运“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在唐代得到了更多诗人的共鸣，韦庄一曲《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道尽对江南美妙

〔1〕 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 潘冷：《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 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